

儒藏

《精華編 四書類論語屬》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儒藏

【精華編 四書類論語屬】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四書類. 論語屬/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9

ISBN 978-7-301-09679-8

I. ①儒… II. ①北… III. ①儒家 IV.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04109 號

書 名: 儒藏(四書類論語屬)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馬辛民 陳大鈞 謝丹雲 金春梅 李 莉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09679-8/G · 1632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zpup@pup.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出版部 62754962

排 版 者: 北京華倫圖文製作中心 北京啟文博雅文化傳播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79.75 印張 80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指導委員會：

名譽主任：季羨林

主任：許智宏

副主任：吳志攀 湯一介（常務）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工作小組：

組長：湯一介 吳志攀

副組長：吳同瑞 程郁綴

成員：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張玉範 魏常海 李中華 陳來 陳蘇鎮

北京大學儒藏出版工作小組：

組長：吳志攀

副組長：王明舟

成員：魏常海 楊立範 馬辛民 李暢然 商鴻業 張濤 李成保

儒藏編纂委員會：

名譽總編纂：季羨林

總編纂：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

《儒藏》編纂出版前言

(一)

在中國歷史上，曾多次把佛教經典及其註疏等文獻編輯為《佛藏》，同樣，也曾多次把道教的經典及文獻編輯為《道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國又編輯了《中華大藏經》等，使佛教典籍的集成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同時，中國道教協會也編輯出版了標點本的《道藏》，為讀者和使用者的提供了一個更為方便的文本系統。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傳統的思想文化，歷來號稱「儒」「釋」「道」三分天下，可是千百年來，我國有《佛藏》、《道藏》，而沒有《儒藏》，始終沒有把儒家思想文化的典籍、文獻集大成地編輯為一個體系，這不僅與儒家在中國歷史

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極不相稱，更不能滿足傳統文化整理與研究日益廣泛深入的需要。編纂《儒藏》的目的和編纂《佛藏》、《道藏》一樣，都是旨在把各家典籍體系經過系統整理，以便收藏和保存，為弘揚和發展中國文化之用。有鑒於此，二〇〇二年十月，北京大學決定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並聯合有關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開啓編纂《儒藏》這一歷史性的學術文化建設工程。

(二)

在歷史上儒、釋、道三家並稱，但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體。從經典體系來看，儒家所傳承的「六經」，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華；而孔子開創的儒家，與先秦其他各家的最大不同，就是儒家始終以自覺傳承「六經」為己任，「六經」所代表的中國古代文化正是通過和依賴儒家的世代努

力而傳承至今。歷代儒家學者對《尚書》、《詩經》、《易經》、《春秋》等經典的不斷整理、解釋和對其中思想文化的推衍與發展，構成了儒家典籍體系的主要內容。由此可見，就經典的根源來說，與根源於印度的佛教和後起的道教不同，儒家的典籍體系不是某一宗教的經典，而是中華文明的經典。

由於儒家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根源，由於儒家的積極入世的實踐精神，由於儒家所具有的深厚歷史感、文化感、道德感，由於儒家在傳承歷史文化方面的自覺努力，不僅使得歷代主政者無不重視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且也使得儒家的價值觀逐漸成為中國人的價值觀的主體。儒家「崇德貴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親」的倫理文化、「文質彬彬」的禮樂文化、「遠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已滲透到中國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儒家哲學強調陰陽互補、和諧與永久變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成為

中國古典哲學的重要基礎。儒家的價值理念，不僅通過個體表現為強烈的道德主義、積極的社會關懷、穩健的中庸精神、嚴肅的自我修養，而且也表現為人道主義、理性態度、重視傳統的整體性格。這一切都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文學、藝術、倫理、哲學、宗教、科技、醫藥以及政治、經濟、法律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歷史地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

中國古代文化是「軸心時代」幾大文明之一，而儒家是軸心期中國思想的重要成分。歷史學家早已指出，「軸心時代」的思想傳統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人類文化的共同財富，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而人類歷史上每一次新的飛躍無不通過對軸心期的回顧而實現，並被它重新點燃。在踏入新千年之際，世界思想界已出現對於「新的軸心時代」的呼喚，這要求我們更加

重視對古代思想智慧的溫習與發掘，以回應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局面。

今天，中華民族正處於偉大的民族復興的前夜，重新回顧我們這個民族文化的根源及其不斷發展的歷史，必將對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發揮重要的作用。爲了能夠系統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經典及其在各個時期的註疏，把歷代儒家學者的著述，把體現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種文獻，編輯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庫《儒藏》，無疑對當今和後世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有着重大的意義。

(二)

歷史上雖無儒藏，但歷代王朝都有過彙編儒家經典的舉措。如唐朝的《五經正義》，宋朝的《十三經》，明朝的《四書大全》，和清朝的《十三經註疏》及各種經解，尤其是清朝編輯的《四庫全書》，收入了不少儒

家文獻。明、清兩代曾有學者提出編纂《儒藏》的建議，終因工程浩大，未能實現。八十年代以來，有關方面又編輯出版了影印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等等。這些都爲我們今天編輯《儒藏》打下了基礎。我們編纂《儒藏》，可以在儒家文化研究方面代替上述所有各書，使得研究和使用更爲方便；《儒藏》還將搜集未收入上述各書的儒家著述文獻，使我們擁有一部最齊備和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總匯。這不僅使我們可以更系統、更全面地瞭解儒家文化對於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重要意義，而且也是使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使全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得以利用中國文化資源檢證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建設。

目前儒家典籍多以影印本形式出版，而《儒藏》將以附有簡明校勘記的繁體豎排校點排印本的形式出版，這不僅便於使用，

而且可以製成電子版進行全文檢索。《儒藏》所收文獻的下限可定在清朝的結束。民國以後的儒學著作可考慮有選擇地編為「續集」。《儒藏》將收入約五千餘部儒家典籍，其中近五百部將作為精華編先期出版。同時著錄萬餘種儒家典籍的《儒藏總目》也將包括在內。

(四)

《儒藏》的編纂已被列入「教育部二〇〇三年度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並於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批准立項。在「項目的通知書」中，教育部要求北京大學「瞄準國內和世界先進水平，認真組織跨學科、跨學校、跨部門和跨地區的聯合攻關，積極開展實質性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力爭取得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的標誌性成果」。該項目於二〇〇四年六月六日又被批准為「二〇〇四年全國社會

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北京大學根據教育部和全國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的指示精神，聯合二十餘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專家，於二〇〇四年夏組成「儒藏編纂委員會」，正式啓動這一歷史性的巨大學術文化工程。

儒藏編纂委員會

二〇〇五年八月

《儒藏》樣書編纂出版說明

此冊樣書所收都是有關《論語》的，而且是《論語》流傳史上有影響的代表之作。其中日本正平版《論語集解》是傳世《論語》的最早、最完整的單集解本，是漢魏古注的集成之作，有其獨特的價值；皇侃的《論語義疏》是傳世《論語》最早的注疏本，也是南北朝《論語》注釋的集成之作；邢昺的《論語注疏》是《論語》的唐宋注疏本的代表，收入頗有影響的《十三經注疏》；朱熹的《論語集注》為《四書集注》之一，是《論語》注釋的宋學代表作，對宋元明清影響很大；康有為的《論語注》是近代改良派思想家古為今用的《論語》注釋之作，雖然解釋上有借題發揮之嫌，但在思想史上具有

重要意義。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本來還打算把劉寶楠的《論語正義》收在樣書內一次推出，因為它是《論語》清代新疏的代表作，可憾因樣書篇幅所限，只得暫付闕如。儘管如此，這次出版的樣書，已不是隨意湊在一起的幾種書，合起來堪稱一部叢書，構成《論語》流傳整理史的一根相當完整的鏈條，具有整體的學術價值。

《儒藏》精華編，按編纂凡例規定，都是校點排印出版。這次推出的五種樣書，正是按凡例做的。首先是關於底本和校本的選擇。凡例規定應選擇精善之本作底本，選擇有代表性的版本作校本，但具體貫徹起來并不容易，需要在版本考察的基礎上仔細斟酌。具體做法，正平版《論語集解》、《論語義疏》、《論語注疏》等書的《校點說明》可以為證。例如《論語集解》，國內單集解本早已失傳，而日本流傳的抄本、刻本頗多，其中以正平本最具代表性。但正平本

也很複雜，自日本南朝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甲辰，相當中國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一三六四年）刊刻以後，流傳有三種版本，即日本學者所稱的雙跋本、單跋本和無跋本。所謂雙跋本，即全書末頁有兩則刊記者：一則緊接正文之末并居卷題之前，分兩行題曰：「堺浦道佑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志」；另一則在卷題之後末行居下題曰：「學古神德楷法日下逸人貫書」。很明顯，前則刊記據刊刻者道祐居士題識刻成，故字體風格與全書不盡一致；後則刊記據書字上版者日下逸人貫所記刻成，字體風格與全書一致，即「日下逸人貫」所學（模仿）「古神德楷法」（據日本學者考證，古神德為奈良朝寫經生）。單跋本則僅存前一則刊記。無跋本則兩則刊記全無。雙跋本、單跋本和無跋本，版式行款完全一致，字體亦有影摹關係，微有差異。個別處還存在異文，當為轉

刻所致。關於三種正平版《論語集解》刊刻的先後關係，日本學者曾經存在不同意見，孰先孰後，見解甚至完全相左。但比較趨同的意見是認為雙跋本為祖本（參見影印大阪府立圖書館藏本《正平版論語集解》十卷後所附《正平版論語集解考》中武內義雄《正平版論語源流考》及長田富作《正平版論語之研究梗概》）。我們同意這種看法，蓋雙跋本既刻有刊刻者的題識，又刻有書字上版者的題記，恰為初刻本的特徵。正平版《論語集解》後傳入中國，因不明「正平」係日本年號，曾經被清代學者錢曾誤認為高麗本（見《讀書敏求記》）。錢曾之誤，雖經清人黃丕烈所糾正（見《堯圃藏書題識》卷一），但沿襲錢曾之誤者仍不少，直到阮元《十三經注疏》仍「據海寧陳鱣《論語古訓》本所引」「高麗本」進行校勘（見《論語注疏校勘記序》後《引據各本目錄》），實間接沿襲錢曾之誤，此誤甚至仍在影響今人。

另外，《四部叢刊》影印本牌記云：「上海涵芬樓借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日本正平本影印」，葉氏即葉德輝，其對日本正平版《論語集解》雖判斷不誤，但所藏《論語集解》却非日本正平版原本。《四部叢刊》影印本《論語集解》與大阪府立圖書館所藏雙跋本影印本，字體雖有明顯摹寫迹象，但筆劃結構有所走樣，甚至存在異文和誤字。并且《四部叢刊》影印本卷八末頁左欄外下端有「朝虎風刻」四字，此四字日本三種正平版《論語集解》均無。朝虎風當為刻工姓名，可以確證葉氏所藏乃是中國的一種新的正平版《論語集解》影刻本，并非原本。至於正平版《論語集解》與皇侃《論語義疏》所據《論語集解》和邢昺《論語注疏》（又稱《論語正義》）所據《論語集解》的關係，比較複雜。正平版正文注文多同皇疏本，而與邢疏本多異，但亦有與邢疏本相同而與皇疏本不同者。這種錯綜複雜的情況說明正平版淵

源有自，是一個自成系統的單集解本，而非出自皇疏本，更非出自邢疏本。同時還可以說明皇疏和邢疏所據《論語集解》各有所本，並不是在兩疏之間前後流傳中產生的差異。根據以上情況，《儒藏》精華編中的《論語集解》，以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所藏雙跋本影印本為底本。至於校本，日本單跋本、無跋本及中國影刻本，皆源出雙跋本，屬於同一系統，無校勘價值，可以忽略；而皇疏所據《集解》及邢疏所據《集解》與單集解本屬於不同系統，且文字各有優劣，則有參校的必要，故列為校本。因此可以說《儒藏》精華編中的正平版《論語集解》是一個底本可靠的新校定本。又如皇侃的《論語義疏》，國內也是失傳已久，清代由日本傳入。日本流傳的《論語義疏》，版本也很複雜，既有抄本，又有印本，北大《儒藏》編纂中心在底本和校本的確定上也花費了一番心思，如《論語義疏·校點說明》

說：「日本印本主要有兩種：（一）一七五〇年日本根遜志據足利學所藏舊抄本的校刻本。此本後傳入中國，除一七八一年收入《四庫全書》以外，還由鮑廷博刻入《知不足齋叢書》（一七八八年盧文弨序），此後又出現了《知不足齋叢書》本的翻刻本。（二）一九二三年日本大阪懷德堂的排印本。懷德堂本是由日本學者武內義雄根據日本國內多種古抄本合校而成，其特點是保持了抄本皇侃《義疏》原有的體式，而不像根遜志刻本那樣將皇侃《義疏》的體式完全比照中國習見注疏體式做過改動。此本儘管存在一些排印錯誤（均較明顯，不難改正），但所保存的皇侃《義疏》的文字較為完整，非常有參考價值。此次整理即以懷德堂本為底本，以《知不足齋叢書》本為校本。」同時還吸收了武內義雄的校勘成果，并補充了新校所得。這樣就等於校定了一個更接近原貌的皇侃《義疏》的新版本。再

如邢昺的《論語注疏》，《儒藏》精華編沒有採用習見的阮元校勘的《十三經注疏》本為底本，因為其用為底本的宋本不詳何本，且改動較多。因此採用綫裝書局影印之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宋蜀大字本為底本，以《十三經注疏》本為校本，同時吸收阮元校勘記的成果。事實證明，宋蜀大字本確實比阮校本好，阮校本多有脫漏。因此《儒藏》精華編的《論語注疏》校定本，明顯超過了阮校《十三經注疏》本。

至於校勘，《儒藏》凡例規定：「校勘旨在提供可靠的文本，要少而精。以版本對校為主。出校以校正誤為主（凡底本不誤而校本誤者原則上不出校），酌校異同（校本有重要參考價值或足以反映版本系統的異文酌情出校）。」要貫徹這一規定，首先要選好底本和校本，已如上述，這樣就打下了以簡馭繁的基礎。其次是嚴格掌握校正誤為主、酌校異同的出校原則，即凡底本

不誤校本有誤者一般不出校，而不像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那樣搞繁式會校。異

文正誤的判斷抉擇和有價值異文的選留，直接關係到校勘的質量和科學性，必須經過嚴謹的考證才能校定。在樣稿中有幾部是在已出版書稿基礎上整理的，這次按《儒藏》凡例重新校勘，通過整理者和《儒藏》編纂中心的共同努力，糾謬補闕，質量有所提高。通過樣書的整理和刊出，我們進一步體會到，《儒藏》精華編採用校點排印的整理形式出版是正確的。這不僅避免了用影印出版的方式而造成與其他影印叢書重復的問題，而且證明如果取法乎上，認真對待，經過努力確實可以整理出具有高學術水平、信實可靠、并且直接與電子版接軌的新成果。樣書還說明，我們已開始利用流傳域外的有關版本，也為我們進一步吸收域外有關成果積累了經驗。

樣書肯定還有不足之處，懇望專家和

參與《儒藏》整理的同人給予批評指正，以便進一步修改定稿。

凡 例

(一)《儒藏》編目的分類主要採用最能代表儒家學術觀的四部分類法，具體類目依據《四庫全書總目》，同時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分類，於個別處略作調整。

(二)《儒藏》收錄自先秦至清朝結束這一時段中，儒家經典及其注疏、儒家學者的著述和體現儒家思想文化發展的相關文獻，包括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

(三)《儒藏》版本的使用首選精校刻之善本，若同一種書經後世儒家進行研究，有增補、附錄、校勘記等，且確能反映當時研究成果，則原則上選用後者。

(四)《儒藏》的校勘和標點，總體依照

一九九一年中華書局總編室擬訂的《古籍校點釋例（初稿）》的要求，略作簡化。校勘旨在提供可靠的文本，要少而精。以版本對校為主。出校以校正誤為主（凡底本不誤而校本誤者原則上不出校），酌校異同（校本有重要參考價值或足以反映版本系統的異文酌情出校）。標點從簡，不使用專名號，書名號採用「『』」形式。散文適當劃分段落。

儒藏精華編

四書類論語屬

論語集解〔正平版〕〔魏〕何晏	一	八〇
論語義疏〔梁〕皇侃	一	三五九
論語註疏〔宋〕邢昺	一	三〇二
論語集注〔宋〕朱熹	一	一三八
論語注〔清〕康有爲	一	三一五